

思维世界里的长跑者

——忆何龄修先生

杨海英

2012年夏天,我去贵州出了一趟差。回来打电话跟他汇报行程,他静静地听着,插了一句:“坐火车要经过我们家……”,然后就好半天没有声音了。我“喂”、“喂”了好几声,也听不见回应。过了好一阵子,才听见话筒里传来纸巾窸窣窸窣的声音——想也不用想,老先生又流泪了。“故乡”是他不能触碰的字眼,却反复萦绕在他的记忆中。



何龄修
(1933—2018)

何龄修先生在迈进此生的第八十五个春天时,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从吃完早餐的饭桌上侧滑倒地,到心脏停止跳动,只有短短的半天时间。那一刻,戊戌年春分时节气子时刚过。当天上午,再陪师母回到他们华威西里的寓所时,院子里的一株樱花正在盛开,在我眼里明晃晃地刺亮着,就像是何式告别,花语是不送。

3月20日是周二,我们返所上班。中午12时,接到何翔师弟的信息,说老爷子吃饭时坐在凳子上摔了一跤,现处在昏睡状态,已叫救护车,在等待。当时,我正走在去北京医院的路上,想来可在医院碰到。因为老爷子平常看病取药和熟悉的医生都在那里。另外,也觉得这次或许还是老爷子“跌倒不下数百次”的日常重复,出点血、破块皮,大不了像2011年春天那样摔断腿骨,反倒是有机会在术后住院期间,跟我集中地聊了好些话题,骨头再接上也蛮好用。本来就身形瘦削的何先生,如今更是皮包骨头,身轻摔一跤,应该不会太严重吧?

但是我想错了。救护车径直拉着老先生去了垂杨柳医院。病房和重症监护室都没有床位,医生的诊断是脑出血(创伤性硬膜下出血,脑疝),不建议手术,转院也面临难题,病人瞳孔已经放大。师母随后打来电话说要回家拿些衣服,我才知道事情不好。懵懂了一阵,想起应该通知所里的同事,随后打车赶到华威西里,陪师母挑了几件衣服,再到垂杨柳医院。看见老先生就躺在走廊中,头裹一个网纱兜,两眼微闭,半侧躺在移动床上,呼吸、心跳都还有,血氧含量已低于正常水平。这时研

究室和所老干部处的领导、同事都已从建国门赶到,经和医院方面协商,何先生被移进了抢救室,紧靠门边安放,一个不大的房间里满满腾腾挤了八张床。他的姿势一直没变,偶尔能听见低低的出气声。无法转院或手术之后,唯一的选择就是保守治疗,吊点多巴胺和葡萄糖水剂。想来想去,我向经历过多次急救事宜的陈爽求教,他和张彤先生也很快赶到,还背着上班时用的沉重器械。

如果大限很快来临,能够准备的实在不多。师母带着先生贴身的衣裤和一套深蓝色的新西装,那是何先生北大的老友胡珠生所赠,却一直没有机会穿。天冷的时候,何先生总喜欢戴一顶帽子,陈爽和张彤陪着我在附近找了一圈,顺利买到了一顶浅灰色的新帽子和一双圆口布鞋。何先生比我父亲大三岁,十多年来,他俩一直是帕金森症的病友。为五斗米折腰的我,没有条件也不方便经常回南方探望、照看久病的父亲,就只能经常去看看何先生,似乎这样可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疚,或转移一

点对父亲的心意。每次,何先生都要送我出门。开始时会跟电梯里碰到的熟人开玩笑说我是“女儿”,到后来就渐渐说成了习惯。起先,何先生一般送我到潘家园地铁口,看我进站再自己一摇一晃走回家。我不放心时也会返头再盯看他一段,有次正好看到彭卫先生带他回家。后来不让他去地铁站了,他就近送我到楼下十字街口,再后来则是师母扶着他送我到楼道电梯口。近一两年,我与师母都倾向于不让他出门,这对他来说难以接受但无可奈何。2016年冬天,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出门,在附近吃了一次淮南牛肉汤。那天,他吃得蛮高兴。我刚进门时,他就齿清楚地说:“不是小牛是小羊(杨)”,典型的“何氏”风格。

师母告诉我自2015年夏天开始,先生的一日三餐或已不时。2017年春节过后,我去看他,老先生面带微笑,很认真地说:“真抱歉,不记得你了,我给你三鞠躬。”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动真格,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直发毛。一个月后,再与同事华川和在成都工

作的学生龙武一起去看他,他又说:“奔前程要紧,看老人靠后。”显然他的脑子仍然清晰,欣喜随之而来。一般没要紧事,我会在下班后去趟华威西里,这些年常搭同事士皓的车,他在小区门口放下我再绕道回家。哪怕是摔得鼻青眼肿,我进门时,何先生都认得是“女儿来了”。但在垂杨柳,老先生始终没有睁过眼。入夜1点30分,值夜班的同事立民来电说何先生心脏停止跳动了。我从医院旁的酒店赶过去,帮着护工和师母替先生穿好那套西装领带,戴上帽子,套上鞋子,室里的同仁存阳主任、到稳等一起护送到太平间。再与师母回到酒店,已是凌晨3点钟。忙乱两天之后,在八宝山竹厅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,单位领导、同事和各界亲朋好友七八十人到场送别。想必先生如果九天有知,应该还是会欣慰的吧?

二

1933年,何龄修先生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个富有文化气息的商人家庭,但身体不是很好。6岁那年患了鹤膝风(中医病名,西医名类风湿性关节炎),无法走路,也不能上学,靠养母辛勤照料和祖父自学中医的朋友许翰源帮助,得以治愈。但留有后遗症,以致在1953年进入北京大学后,不能学习他的第一志愿考古,“第二志愿还是考古”,不得已改学了历史专业。而老年罹患帕金森综合征后,不仅手抖得厉害,写字、吃饭都遭遇困难,走路更是蹒跚摇晃,像是随时都要摔倒,看得人心惊肉跳。伴随他的还有老年性目疾:复视、白内障、眼干症等日益严重,听力也大大受损,到几乎完全失聪的地步,大脑运行的时空错乱更日渐经常。他自

己说:“这些祸害,打击了我的信心,几乎使我要相信童年的厄运会在暮年卷土重来。”但是老先生的顽强也可惊天地泣鬼神。如果不是最后这一跤摔得不是地方,或许他永不停顿的大脑可能还会不断迸发出奇迹。

何先生的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:前20年、后18年及退休后。从1958至1978年的前20年,主要参与完成的都是集体研究项目,后18年相对自由些,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,这些经过我都不清楚,只能通过他的自述得知一二。

他最愉快的日子应该是在退休后。自1997年春开始参加先师王钟翰主编的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,任第一副主编兼学术部主任,与一直有“老交情”的古籍打交道,这使他兴奋,工作效率也很高。他自己说是眼、手、脑并用,经他三审复核的内容,占全书总册数略超六分之五之多,还起草编纂缘起、编纂后记、补编说明。例如山东省图书馆征得的明人无名氏《新纂乾坤宝典天文》钞本混乱错杂,不堪卒读,他审读了约600页,将之归类,重新编排、定序,顺利完成了任务。他曾说:“乾隆作的恶,由一群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来替他处理一项重要的善后”,“这是历史开的一个不可思议的玩笑”,由此也自觉豪情满怀,不负此生。

贯穿这三个阶段的是先生从做学术秘书起养成的一个习惯。他曾协助杨向奎先生经营清史研究室,行“分兵把口”之治,根据研究室人员的爱好、特长,选定主攻方向,培养研究生等。虽然自谦这个工作没有全部完成,但实际上在退休停止返聘后依然如故,可以说是死而后已。因为这是“很有意义而且令我很得意的一项工作”,也是他喜欢、热爱